

讓世界走進來，讓台灣走出去 ——2002年台灣文學綜論

◎ 陳建忠



圖1 台灣的名字和形象，本身就很多元，鯤島、FORMOSA、蕃薯、海翁（鯨魚），意象都很親切活潑。若要更深刻表達台灣與世界的依存共榮關係，那麼小海豚和大海洋的相得益彰，更具有生動自然的寓意。（廖鴻基 摄）

一、回顧一年：蕭條的經濟，不蕭條的文學

時序進入2002年後，關於台灣經濟蕭條的景況，似乎依然還是人們議論的話題。然而，意外的是，我們並沒在文學發展上看到蕭條的景況。也許購買力減低了，但有創作力或閱讀渴望的作者與讀者增加了，看來文學創作與閱讀並沒有蕭條這回事。回顧一年來的台灣文學發展，基本上仍可說是蓬勃的，除老手與新人的精采作品紛呈外，也還有本年度頗值得關注的新現象，如影音時代文學傳播的新型態、翻譯文學交流、台灣文學系所建制化後的走向問題等，說明台灣文學界生機勃勃的一面。不過，我們的綜論不想僅僅記錄這一切，還希望提出一些值得反思的觀點，讓回顧兼具有開新的契機。

從戰前至今，台灣新文學的發展已經歷七十餘年的時間，如今台灣文學的大家族已然有六、七代之多了罷！本年度的文學創作，首先就可以注意這種數代作者同聲合唱的畫面。老作家紀弦的《紀弦回憶錄》從來台寫反共文學說起、朱西甯戀戀山東家園的遺著《華太平家傳》，可以讓我們回想起是五〇年代來台作家的時代特性；至於白先勇散文《樹猶如此》、張惠菁執筆的《楊牧傳》，也見證六〇年代作家的演變。這些作品置諸今日多元化創

作的時代，與其他世代作者的作品合而讀之，由這個血統駁雜的文學族譜，可以窺見台灣文學戰後的發展過程曾經有過如何激烈的變動。

文學族譜中，中生代作家的許多創作，依然具備引領文學閱讀風潮的實力。像舞鶴《舞鶴淡水》、陳輝《烈愛真華》、平路《何日君再來》、簡媣《天涯海角》、藍博洲《藤纏樹》、夏曼·藍波安《海浪的記憶》、李永平《雨雪霏霏：婆羅洲童年故事》、宋澤萊母語詩集《普世戀歌》、楊照《爲了詩》。無論寫原住民、波羅洲，用母語寫作，或者關切女性、白色恐怖當事人的處境，台灣文學在新千禧年開端，已形成的「多種族」、「多語言」的風景與格局，年度的作品都有具體的體現，也是台灣文學最足以面向世界的一種文學特質。

新生代作家中，潘弘輝《人馬記事》、杜修蘭《沃野之鹿》、袁哲生《倪亞達臉紅了》、李欣倫《藥罐子》、童偉格《王考》、許正平《煙火旅館》、盧郁佳《愛比死更冷》，也都各逞其能。從鄉土到科幻題材，從童話到歷史反思，台灣新生代作家並沒有深度減低的問題，他們都以相當具創意的角度針對上述的範疇有精彩演出。值得一提的是，靜宜大學中文所研究生編輯，巫永福先生資助之「台灣文學研究叢刊」創刊號《文學經典與台灣文

學》，這份針對文學研究生所辦的刊物，同時設有「台灣文學研究網站」，可說是年輕研究者對文學界發聲的一種新嘗試。

至於作家全集的編纂，本年度也不斷有豐碩的成果，像《詹冰詩全集》、《葉榮鐘全集》、《李榮春全集》、《李魁賢詩集》、《李魁賢文集》、《鍾肇政全集》、《王昶雄全集》、《周金波集》、《張文環全集》、《洪醒夫全集》，這些作品的出土或整編，「具體」地說明台灣文學的體積與內涵。舊作重印的作家也有不少，趙滋藩、白先勇、余光中、朱天心、張大春、林懷民、琦君等，都是卓有聲譽的作者，其舊作重印，多少有吸引更年輕一代讀者的意味，是值得鼓勵的出版風氣，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的絕版舊作得以重見天日。接下來的問題是，應思考如何將他們推介到與民族文化傳統疏離斷裂甚遠的年輕一代讀者面前，讓那些台灣人生活的經驗與思索，可以一直延續下去。

不僅有新人新作，另外，新出版社的創立，也改寫了文學版圖的面貌。本年，有多位資深的編輯人初安民、焦桐、陳雨航、郭重興，分別創辦印刻文化、二魚文化、一方出版社與共和國文化（包括木馬、左岸等出版社），並接連推出許多創業作，文學出版的戰國時期來臨，讓讀者有更多的閱讀可能，未嘗不是好事。其中引進中國作家（王安憶、張承志、張

煒），中國譯本的世界文學，以及編撰「台灣現代文學教程」，都是本年新出版社的新作爲，可算是本年度出版業界重要的事件，其影響值得來年繼續關注。

再有值得注目的是，相較於前幾年的文學年鑑體例，本年度特別關注到較少受到關注的，台灣西部文化活動以外的東部、南部或離島等地的文學活動。屏東縣南榮國中設有校內文學獎，可說是播灑文學種子的活動，值得鼓勵。金門雖是離島，但在許多有心人的扶持下，從文史採風，到即將創刊的《金門文學》叢刊，連同許多離島，確實都是台灣本島文壇需要關注的對象，也是未來文學年鑑應該設法記錄的一頁，不能有所偏廢。位於後山的台東，隨著幾位原住民作家的崛起（藍波安、撒可努等），頗獲文壇矚目，這種具備地方特殊性的文風，對於台灣多種族文學的平衡發展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二、影音時代與文學傳播

年度概況的回顧既如上述，似乎可以看到本年度文學現象的一些特點，值得提供出來思索。我們認爲，台灣文學乃是「空間上」與世界相通，而「時間上」又是與其他歷史階段有連續不斷的因果關係，以這樣的視野，我們對本年文學發展的重要改變與可能影響提出來說明，不僅

可以進一步觀察到本年度文學發展的軌跡，亦能藉此思考未來在全球化時代與影音時代文學發展的契機。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電視史上首部客語連續劇「寒夜」，於2002年3月在公視頻道上演。這是改編自李喬所寫的大河小說「寒夜三部曲」中的首部曲《寒夜》。這齣文學大戲，可以視為近幾年一連串文學影像化的潮流中，——如以琦君的小說編劇之《橘子紅了》，或本年四月開鏡的白先勇小說改編之《孽子》，或是籌拍中之鄧相揚《風中綯櫻——霧社事件》改編之報導文學歷史大戲頗引人注目的一次演出。電視劇與文學的結合，說明運用大眾媒體推廣文學的可行性。

除了有官方奧援的文學電視劇外，官方也補助作家網站建置、「網路現代詩」網路詩多媒體製作、「文學咖啡屋」網路製作，還主辦「兒童文化館」童書繪本網站等，皆可見出文學與媒體之密切關係。其中，文學家傳記影集也是值得開發的領域，無論在教學或推廣上，這些影像化的文學故事，更能快速地帶領現代讀者進入文學的殿堂。

這正是影音或圖像化時代，人們對於接受文學作品的新頻道現象。面對現代人閱讀型態的改變，透過網路或影音方式將文學傳播出去，似乎已成為書面文學以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因此所謂「網路文

學」、「影音文學」也是值得注意的新興文學場域。其實，文學活動原本不限於作家或書面創作，具有文學質素的各種表現形式，諸如音樂、電影、美術等藝術型態，其實都能與文學結合。我們認為，這是官方或創作者可以關注的發展方向。至於書面文學是否有被取代的危機，或影音化後的文學是否等同於「簡化」、「淺化」文學的內涵，恐怕就是這一波新興文學傳播型態潛在的問題了。

三、文學教育與典律政治

這裡，想延續這幾年一直被提起的話題，本年度的文學發展，依舊提醒我們必須思考，文化主體性的建立與文學典律的建構，是不可或缺的。民間有民間的典律選擇機制，官方也有責任擔負文學生態的健全發展。因此除推廣包括世界文學在內的各種文學閱讀活動外，對於台灣文學之認識與認同，應該要正面來解決。由於台灣特殊的歷史與政治條件，何謂「台灣文學」已成為眾家爭奪詮釋的「招牌」，學子與民眾常無所適從，各種文學讀本與文化認同的關係不能放任不管。文學體制的健全化，使正典化作品引導閱讀文學風潮，應是可以注意與鞭策的文學傳播場域與管道。

本年度，教育部針對「九年一貫課

程綱要」中，改「鄉土文學」一詞為「台灣文學」的動作，此舉該被視為「正名」或「竄改歷史」，曾引起不小爭議。這也和設立台灣文學系所一樣，本年成功大學的台灣文學系，從大學部到研究所（碩、博士班），已有了完整的建制，說明國家教育體系中台灣文學初步具有合法的地位，只不過，援往例，在國家認同錯亂的台灣而言，這往往又成為爭議的焦點。

《聯合報》在「社論」中曾有〈否定鄉土文學就是篡改台灣歷史〉（2002年12月30日），來反對九年一貫課程綱要的「正名」決議。有趣的是，當年反對鄉土文學說是具有工農兵意識會危及政權的反對者，現在為反對「台灣文學」一詞，說是具有獨立自主意識，反而讚揚起鄉土文學，暗指談台灣文學就是「特定意識型態」的表現，而當起了鄉土文學的捍衛者。我們可以思考，在沒有稱「台灣」這個名字的年代稱文學為鄉土文學，而後歷經萬難「正名」為台灣文學，不正因為鄉土就是台灣嗎？或者說，時至今日，台灣還只能是地方性的鄉土，而果然還另有幾個鄉土？有更大的哪個鄉土值得台灣人去捍衛嗎？這個事件所暴露的依然是糾葛不清的「鄉土何在？」的問題，就像教科書中，還是認定南京是台灣人與中國人的首都（台北與北京的地位都被「神話」遮蔽了）一樣，在文學教育體制中，依然擺脫不了

這種魔咒。

我們曾在2001年綜論中問到：「有誰能統合台灣多數人的美學與國族認同，而表現於選本、教材之上呢？文學教育只是陶冶學子關於真美善的感受，或者還具有積極認識、甚至認同其文學傳統的作用？」當然，我們也要具有批判性地意識到，那些「鄉土教育」、「認識台灣」、「台灣文學」的課程，因具有相當程度「由上而下」的改造、矯正企圖，雖說具有某種程度出於認識我族文化的教育「正當性」，但國家機器的介入，其所造成的特定政治立場的干預，卻不能重演獨裁者的舊戲碼。

因此，批判性地重建台灣文學教育體制，除了要重視文學傳統的傳承與國民意識的關聯，更要避免文學教育造成的意識型態霸權，如何拿捏兩者的平衡，誠然是我們努力的重點。因為，文學教育不是政治教育，而應該是讓台灣人透過文學認識自我與世界的一種媒介與方法。國族主義的幽靈在台灣徘徊著，但願這不是另一個霸權的降生，而是更尊重生命經驗的新價值的誕生。至於那些「妖魔化」台灣文學的論述，我們需要分辨哪些是政黨惡鬥的結果？哪些又是保守思維的復辟？因為我們需要超脫政治正確的台灣本土觀點的文學教育體制。

四、文學的進出口業務：翻譯文學的出口與進口問題

影響文學生態的，除了上述影音時代改變人們接受文學的型態外，文學教育與典律的確認，也是另一種引導閱讀的重要力量。但，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全球化時代，台灣文學界如何「讓世界走進來，讓台灣走出去」的問題，這在本年度也有頗具代表性的現象可供思考。

台灣出版商引進中國譯者的譯本，其實早在十多年前已經屢見不鮮（多以化名出之，或不署名），但規模與意義不可同日而語。本年度一舉引進的有：《托爾斯泰全集》、《川端康成文集》、《三島由紀夫文集全集》、《波赫士全集》、《法布爾昆蟲記全集》等出版品，固然是因應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後的一種出版流通現象，但除了交流的這層意義外，其實頗堪思量處甚多。在台灣這樣不重視譯事，同時也不重視外國文學引介的環境裡，文學翻譯的依賴現象會使我們的讀者與創作者在方便地接受翻譯文學的同時，連帶的被其語彙、語感影響到何種程度，是值得有心人士關注的問題；至於具有台灣觀點的世界文學解讀視角，對一個不重視譯介的國度來講，更是幾近清談！畢竟，譯事的落後，不僅讓詮釋外國文學的權力由翻譯人掌握，也讓嫋熟外文但不從

事譯介的某些菁英壟斷發言權。表面上，整體的效果是台灣門戶洞開讓許多出版物流入，但事實上卻是被動地接受，自己無法提出對於世界文學的台灣觀點的看法，而這種翻譯上的「依賴主義」連同其潛在可能有的「內化」翻譯者觀點與文學語感的問題，正是台灣文學進口翻譯出版品時需要正視的。

此外，文學進出口業務中，台灣文學走向國際，向國際出口台灣文學的翻譯本，也是台灣文化向世界證明自我成就的重要工作。目前可見的工作是，官方曾獎勵文學作品之外譯（現今已譯成英、法、德、俄、日、韓、越南等國的語言），並組成學者與作家國外訪問團加強國際交流。另外像「台北國際書展」、補助高行健《八月雪》歌劇公演等，亦是積極向世界展現主辦大型文學活動的能力，兼具有國際宣傳的成效。本年度，由官方或基金會資助，持續進行中的文學外譯工作，成果有譯成日語的客家小說集《客家的女人們》，另外由美國王德威負責的「二十世紀台灣小說英譯選集」計畫，在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已出版過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鄭清文《三腳馬》、朱天文《荒人手記》、黃春明《蘋果的滋味》、李喬《寒夜三部曲》、李永平《吉陵春秋》等。

我們的看法是，作品外譯固然可增進國際社會對台灣文學的瞭解，但如何維

持台灣的主體性面貌，而不是讓譯本成為另一個問題，應該予以正視。例如「詮釋」的工作，便是需要加強的面向。因為除「外譯譯者」的選擇與「作家作品」的選擇外，實在應該加強「對外的詮釋」工作，讓台灣文學的特色，正確地被傳播到國際上。我們以為，國外的翻譯者固然對中文漢文有一定造詣，但對於相關作品的觀點，未必能盡然符合台灣讀者的期待，尤其是官方出資的翻譯工程，更應該注意到後續的傳播問題。

因為透過作品所展現的台灣文化認同與台灣國際地位等問題，皆需進一步詮釋後才能為國際社會瞭解，而不至於仍複製甚或延續舊有的刻板印象，這是與翻譯同時需要進行的工作。但，說來這又牽涉到台灣或譯者對相關問題的爭議，使詮釋者的意見往往分歧甚大。這方面，官方的資助單位，恐怕需有更明確地態度才行。畢竟，文化工作並非形式上地發包、交差就行，台灣要用何種面目示人，應該還是要整理一下儀容後才好走向世界舞台，而這需要更周延而有計畫的思考才成。

五、結語

我們在去年綜論中曾說，我們不需要說夢者，而是需要用實踐創造下一輪的台灣文學盛世，但我們首先需要的是確認

共同關心的目標。在泡沫經濟來臨時，如何不讓口水的泡沫淹沒了我們對於台灣真正問題的關注；從而也不要讓台灣文學的發展契機如同泡沫一樣蒸發，應該是有心人值得平心靜氣，以文學人的立場，而不是隨著政治魔笛起舞，來思考如何讓世界文學走進來，讓台灣文學走出去。因為我們認為，在多元的時代，還是可以有共同的關懷，從2002年的文學發展回顧中，我們毋寧是看到了蓬勃的生機，也有許多共同的議題足供思考解決之道，來為下一階段在全球化、文化認同、閱讀習慣等劇烈變動的條件下，預作台灣文學出路的準備。